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三十二次全体会议

1999年10月8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古里拉希先生.....(纳米比亚)

下午3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10(续)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A/54/1)

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昨天的会议提早休会似乎是对回到现实的一个象征性召唤。

我想表示感谢召开这次会议以及秘书长通过提交报告和他一般在一般性辩论开幕式的讲话为我们提供的机会。正如在以前的发言中一直看到的那样,我们大家都同意急需进行一次深入讨论,在这个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的干预时代指导联合国的工作。

没有一个国家比古巴更乐意进行变革,也没有一个国家比古巴有更大的才能和勇气面对新老问题,而对人类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似乎离得更远而不是更近了。没有人比我国人民更能体现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信心。这不是一个应付全球化挑战和使过去的陈规现代化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比古巴自1959年以来变化更大,或以更多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来寻求改变这一不可持续和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但我们相信,在这样做时必须要有坦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不是躲避痛苦的现实。

在这一大厅里有任何人会相信以下这一点吗?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会在因特网上或报纸上看到,在没有白宫同意的情况下,一个东南亚国家要求或获得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干预密歇根州发生的白宫无法控制的国内冲突,这一冲突源自著名地方民兵的疯狂行动。

难道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以下情况?即一个非洲国家联盟可以在某个欧洲国家日益增长的仇外情绪正在迫害移民或其本国少数民族时,不顾其合法政府的意愿,对其进行干涉。

或许这一辩论的目标是确定联合国如何能够对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市场和毒品使用中心进行干涉?

或者是讨论如何防止某个拥有核武库和成千上万个核弹头的国家在不负责任的傲慢行为或疯狂行为中发射若干导弹、常规武器,还是反之?

我希望南方国家忍受的这种不公正、不可持续和专制的世界秩序能够由一个工作组来重新设计,或由大会的一个决定来加以改变。事实上,在这个大厅里的我们对未履行的决定、空头支票和被挫败的希望都了解得太多了。

秘书长提出了关键的问题,并触动了敏感的神经。现在各会员国有责任给他一个明确迅速的授权,以防止黑暗和强大的霸权利益在我们忙着编写文件之时继续在现实世界中扩大力量。我们有面对即成事实的危险。

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难题是,未来在某些情况下,是否继续允许一小撮垄断必要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国的干涉,这是我们在这一大厅所不能决定的现实的结果。古巴希望声明,绝不允许在任何借口或情况下对古巴进行干涉,因为这是古巴人民的主权意志。

正如三十五年前切·格瓦拉在这一大厅所解释的,我们的人民已经面对过一次核干涉的危险,现在则天天面临距我们海岸90里以外的那个超级大国的干涉威胁。

99-86082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对主权的这一解释和行使不允许被肢解得面目全非,这也是我们对所有国家的希望。

我们理解全球化世界的现实,将努力争取公正、发展与团结的全球化。但是在单极和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条件下;在超级大国经济和军事专政下;由于强加单一模式、核俱乐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令人憎恶的军事理论、所谓全球威胁、将各国置于“欧洲-大西洋边缘”、对联合国的财政讹诈、一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暴政以及安理会的多重标准;大会受到严重损害;以及对人权问题的政治选择和操纵方式——鉴于这一切,批准在科索沃行使的全球干预权利是自杀。

我们不是要求国际社会或联合国面对种族清洗和其它罪行漠不关心和不采取行动。相反,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再次要求联合国采取坚决和紧急行动,以寻找越来越多冲突的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大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必须明确和直接地授权秘书长立即采取措施。

历史雄辩地表明,不能以武力或战争强加和平,军事行动不导致持久解决办法。除非我们改善遭受欠发达和贫穷的五分之四人类的生活条件;除非我们能使 13 亿人免于极端贫穷;除非我们可以制止 800 万儿童每年在其第一个生日前死亡和 1 900 万 5 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于可医治的疾病和营养不良;除非我们可以喂养 9 亿饥饿者;除非我们可以医治 2 300 万已感染艾滋病的非洲人;除非我们可以教 10 亿文盲读书和写字——除非我们能够做这一切,否则冲突将继续下去。

除非我们制止不负责任地印美元以及使各国用多年牺牲积累的储备金在几个小时内一扫而空的金融投机;除非工业国家的金融机构象对我们的机构要求的那样透明;除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实行不人道的结构调整方案;除非联合国及其发展基础设施免遭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攻击和支配;除非设立面向社会的新金融结构;除非市场的盲目疯狂得到制止;除非阻止跨国公司日益控制我们的经济;除非制止各国政府日益软弱和缩小;除非履行第一世界将其国民总产值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除非阻止不计代价地强加的、甚至第一世界也不执行的自由化政策;除非富裕社会给我们带来贫穷的不合理消费得到制止——否则冲突将继续下去。

冲突将继续下去,只要北方继续强加不完美以及环境和经济上不可持续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在北方也许可以发挥作用——几百年绝对君主制,没有自由或公正选举,没有普选权,妇女没有投票权,没有 8 小时工作日,没有今天所谓的“善政”之后出现的模式,虽然这种概

念尚未界定或商定。我们拒绝认可没有参与,广泛弃权,没有公正信誉以及广泛政治商业化的模式。除非殖民帝国强加的文化和人为边界被视为许多目前冲突的主要历史因素,除非接受独立和自决权利并理解文化和模式的多样性,否则冲突将继续下去。

如果仍期待国家瓦解,如果没有坚定地接受现存边界不可侵犯性,冲突将继续下去。如果继续对人权进行政治操纵——选择性、偏袒和双重标准;如果忽视经济和社会权利;如果无视发展权利;如果实行世俗和抽象的国际人权法;如果不保障所有人的人权——冲突将继续下去。

为了采取行动,联合国必须紧迫地实现自身民主化。大会必须坚定地行使其权力,甚至在冲突领域中。根据《宪章》,联合国在冲突中采取行动的手段不只是安全理事会的广泛权力,大会也有这种手段,大会不允许全球或区域霸权政治,大会没有过时否决权,每个国家在大会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安全理事会必须扩大并使发展中国家具有公平代表性。否决权必须消失,目前至少应限于《宪章》第七章。必须停止实行双重标准。必须避免安理会的过分做并纠正其缺点。必须支持安理会的正当权威,防止这种权威遭到侵犯、忽视和操纵。

《宪章》的主导地位、绝对正确性和不可侵犯性应通过行动来恢复。《宪章》不仅是另一个法律来源,而且是联合国的基石以及摇摇欲坠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剩余物。它是人类为防止、避免和解决冲突而设计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

我们不接受“武力支持的外交”的想法,也不接受“基于使用武力的外交”的想法,即用火力强加外交的企图。我们认为,在科索沃试验的那种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完全违反《宪章》和《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十分清楚地确定联合国可采取武力行动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件。古巴绝对反对任何不符合《宪章》规定的武力行为。这种行为不可能有任何道理。

掩饰干预和干预主义,将其描述为“人道主义”的做法不仅令人无法接受,而且还歪曲我们在联合国对真正人道主义援助采取的法律框架。不言而喻,《宪章》没有任何条款规定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因此,我们怀疑这种概念是否载于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宪章》修正案。如果情况如此,本组织具有一套应遵守的既定程序。这种程序除其它基本要求外包括所有会员国参加的讨论和决策。

有些人使用众所周知的伎俩,试图秘密地强加《宪章》没有的概念,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他们在联合国政策规划和执行机制中可找到的任何微小漏洞,这是本组织不能接受的做法。

我们同意许多同事提出的意见,即联合国需要创造一种预防性文化。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必须是我们大家就创造这种文化的范围以及实际意义,以及应当采用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理解。

毫无疑问的,还应当对于可能演变成冲突的现象建立适当的早期预警机制,但是,如果通过几乎完全由工业化国家为方便取得世界其他国家资料而掌握的机制来建立,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多年来,向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实际上只能是明显而公然的干预的前奏。

预防性外交得到了大肆渲染,但现实中没有告诉我们其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清楚这一概念与历史上而且从定义上由本组织秘书长进行的调解或斡旋之间有什么区别。现在这一名称的改变就告诉我们这种概念在实质上也有了变化。我想大会有权利知道这些变化是什么。

现在会上很少谈论协商一致的原则,而侈谈强制性实现和平,却又不考虑到,在有公正和平等的世界里,不应当强制实现和平,而是应当通过发展、每一位公民的平等机会,消除营私舞弊以及保证人民真正参与决定自身命运来实现和平。

总之,没有任何借口可以用来违反国际法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这些原则是发展中国家能够以合法方式维护其独立的唯一保证。只有安理会才有权利按《宪章》采取需要使用武力的措施。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使用武力是非法的和不合理的。《联合国宪章》并提供了机制,使大会能够即使在安全理事会无法行动的时候也能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每个国家都有权发展其自身的政治秩序模式和经济及社会发展模式。将外国模式强加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合法的。使用双重标准也是不能允许的。

古巴宣布支持联合国及其全面性改革。依据这一不可怀疑的理解,古巴支持勇敢的、诚实的、合法的和果断的措施。我们绝不能利用这些措施来为少数几个霸权主义大国使用或滥用权势和武力提供依据,或者破坏我们的主权以及保证主权的诸项原则。相反的,我们要用这些措施来解决这种行动的根深蒂固的原因,例如在我们这一满目疮痍的世界的某些地区所发生的那种

人类悲剧后面所发生的戏剧性现象。历史不会原谅我们袖手旁观或者缓慢的行动。

拉米罗-洛佩斯女士(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发言,并感谢他在 A/54/1 号文件中的报告,报告向我们综合地阐述了联合国的工作。报告反映了我们会员国委托联合国组织的日益多样化的任务,并且向我们提供了令人深思的意见,值得仔细审议和审查。

我们不断演变的世界对今天的联合国提出了挑战。我们并不否认国际政治中的变化与演变为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福利,但是国际社会仍然忙于无休止的斗争,以便实现和平与发展,保护人权,促进法律规则,并制止不公正和犯罪行为。正当新的千年渐渐地降临之际,联合国现在比以往更加面临着如何发挥其前所未有的创造力的挑战,以便重申缔结联合国组织的《宪章》的各项原则。

但是联合国需要以批评的观点来评价其工作情况,甚至重新考虑其为推行《宪章》各项原则是所惯用的许多方式。无论是目前还是不久的将来,都没有替代联合国满足世界在过渡中提出许多需求的任何机构。其会员国应当坚定地作出努力,帮助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有效的和改良的世界机构,以便能承担起国际社会所要求的多方面责任。

这些责任中最首要的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本世纪末的今天,联合国再次成了一个主要的行动者,要求其干预许多危机局面的许多要求本身就是明证。安全理事会是承担这些责任的主要机构,但是,正如前面的发言者所指出的其高高在上的结构形式以及决策过程过去和现在仍然会受到否决权的阻碍——使人怀疑安全理事会是否能够代表国际社会,而不只是安全理事会有影响的理事国。这一因素使安理会更应当紧迫的认真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使其能够更为迅速的对危机局势作出反应。

秘书长报告中提到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鉴于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危机和复杂的人道主义局势,有关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及其对传统的主权观念的影响。今天,冲突的性质有了变化;其影响和起因更为复杂,更为深远。

现在的这一新设想似乎要联合国发挥更加主动干预的作用,还不只局限于促进对立各方取得折衷的政治性解决办法,相反的,这一作用还包括解决冲突的某些根本性起因,创造例如选举等政治参与的条件,训练文职工

作人员及警察,加强民主机构,等等。在较为严重的情况下,联合国甚至可能担任政府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工作。由于其本质上的方向是针对冲突和暴力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起因,并针对根本性的改革和对这些冲突的较持久的解决办法,预防性外交及建立和平的干预往往使联合国卷入各国内部事务的程度比以前要大很多。不用说,这种可能的事态使许多国家感到关注。在目前的民主和国家主权的意义可能会出现难预测的变化时,这种争议可能会持续下去。

我国外交秘书长10月1日在本届大会第21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发言中清楚地表达了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说,

“国家主权是重要的;它将永远是重要的。个人主权也是重要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对其中一种主权的重新定义与对另一种主权的意识的增强同时发生,这不是偶然的。甚至不需要将这两种情况看作是平衡的,就象它们不会会合一样;因为它们事实上是彼此会合的。”

“但是,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重要的问题是联合国——国际社会的这个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尽管是不完美的机构——如何对影响世界如此多地区的政治、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反应。我们在处理与大规模和系统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问题时必须采取更有创新性的作法。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为使联合国有足够的授权以实行它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需要承担的《宪章》任务,我们会员国必须更新我们的国家利益概念。”

关于联合国、区域组织和安全问题,我们同意秘书长的一项看法,有必要和应该为区域和分区域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安排和措施提供支持。联合国由于缺乏处理世界每一个区域的记录本地区特点的所有问题的能力,支援和专门知识,所以只应补充,而不是取代区域和平努力。

秘书长的报告中所提到的人道主义挑战是我国政府的核心关切问题之一。为冲突受害者提供援助在道义上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作为对旨在解决冲突的措施的一种补充来进行。虽然人道主义援助是一种立即作出的反应,但同时它也是朝着完全恢复、重建和发展而迈出的必要一步。人道主义援助不仅应排除任何政治内容,而且必须尽可能为冲突后的增长奠定最初的基础。同时,它应充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并与他们进行协商,并征得他们的完全同意。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作出了最大努力以确保对各种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协调的机

构间反应。需要采取及时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尽可能减少生命的进一步丧失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因此,极其重要的是立即动员救济援助并将其发送到需要紧急注意的地方。在这方面,非常重要,应该在没有不必要的拖延的情况下对需要进行估价,以便为预期的捐助者提供必要的资料,使他们能够对呼吁作出迅速反应。

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袭击继续在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中构成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各国,特别是所在国应作出一切努力以确保参与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

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往往是复杂的局势,需要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提供帮助的方面的参与。特别是在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地方,机构间的合作与协调必须确保其他国际和地方的活动者,例如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宗教团体和其他私营部门团体的参与。

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一般性的法律文书在处理人权问题时是不充分的。本组织不失时机地填补这个空缺。今天,我们有涉及几乎所有领域的人权法律文书。但有更多的事需要做。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强调了一个悲惨的事实:人权在全世界遭到任意践踏,种族灭绝、大屠杀、任意与即决处决、拷打、失踪、奴役、歧视、普遍的严重贫困和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仍然没有消灭。

我们不仅需要为人权的所有其他领域缔结标准文书,我们还必须加强现有文书的実施和遵守制度。在这方面迈出的一步是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参加谈判的人当时面临着很多涉及敏感问题的难题,但他们在秘书长的帮助下努力解决了其中很多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实施规则。这些困难现在不象以前那样大。我相信,起草这些规则的筹备委员会将在这项任务中取得成功。

菲律宾欢迎秘书长通过提高效率和制订一项促进出色的管理和责任制度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来改革本组织的努力。我们赞赏内部监督事务厅在它成立以来的五年中在加强本组织内的管理责任制度方面作出的贡献。

菲律宾注意到秘书长准备把由于采取提高效率措施而节省的资金放在发展帐户中,并将其用于新的项目。虽然我们支持了发展帐户的设立,但我们当时强调,由于工作效率提高而将资金转入发展帐户的作法不应是一项减少预算的行动,不应导致非自愿的解雇工作人员,并且不应影响所有规定的方案与活动的充分实施。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尚未完成关于业务方法和发展帐户的可持续性的讨论。我们希望,这将很快完成。

菲律宾严重关切地注意到报告第 294 段中介绍的联合国继续面临的严重财政局势,这妨碍了本组织有效率和有效地实施规定方案和活动的的能力。我们前几天听取了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为那些为各种维持和平行动提供部队和设备的国家提供现金补偿方面的严峻前景,而这些国家中很多是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不会缓和,除非从会员国,特别是一个主要资金提供国收到相当数量的欠款。我们认为,解决联合国持续的财政危机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所有会员国,特别是那个主要捐款国不进一步拖延的支付欠款,并全额、按时和没有条件的支付其今后的会费。

武泰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想感谢秘书长起草和在 9 月 20 日提出我们今天正在大会中审议的报告。在一般性辩论开始时在一个全体会议上提出报告的决定是一种积极的创新作法,使部长级辩论的核心更加集中。这个文件无疑是令人感兴趣的。对本组织活动的描述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在全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看待本组织的作用和行动。此外,报告提供了一个机会使秘书长能够指出这一年的主要事件和挑战,并加上口头的说明或结论,就像他在提出人道主义干预问题时所作的那样。几个发言者提到这一点,我们早些时候听取了埃及常驻代表提出的程序性建议。

我们认为,该报告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以下结论: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力继续要求本组织深入地适应新情况,并要求秘书长在更大的程度上准备恢复本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应该发挥的核心作用。

当秘书长宣布:

(以英语发言)

“我把恢复联合国在争取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中的应有作用,并使它更接近它所服务的各国人民作为我的最高职责”(A/54/PV.4)时,

(以法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完全支持他和他为使联合国转变为一个更简单、一体化和核心更突出的组织而作出的努力,这个组织应能在它的各个活动领域中以最大的协调和效率执行其任务。

秘书长的看法值得得到我们支持,特别是因为这些看法产生于一项整体的调整倡议,它旨在使整个本组织适

应于现代世界的需要。该进程需要各会员国的坚定承诺以及一种集体性的、迅速和明确的反应。秘书长明确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在其中有缺陷、支离破碎或具有所涉狭窄利益观点特点的方面、尤其是危机。对总体利益的更好的看法以及更好地坚持《宪章》的价值,将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本组织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全球作用,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发展联合国政治任务与发展工作之间的重要联系,以及确保作为本组织的关键部分的人权与国际法方面取得进展。

还应当强调报告的另外五个方面。第一,我们不幸看到袭击加勒比、土耳其、希腊、台湾、巴哈马、印度、孟加拉国、中国以及各区域很多其他国家的自然灾害的可怕后果。我们同感悲痛并哀悼受害者,将继续以具体方式表示我们的声援。秘书长正确地提醒我们注意进一步发展和更好地装备早期预警系统的必要,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对这些情况作出反映。

第二,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新的全球环境需要联合国和参与在各级促进政治和经济安全的所有其他角色之间的更系统的合作,不管这些角色是区域组织,甚或是非国家的重要角色。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鼓舞的联合国同布雷顿森林体制之间的对话中取得的进展。

第三,秘书长还强调联合国财政状况的极度严重性,本组织的财政健康在过去 12 个月中没有得到改善。比利时认为,那些拖欠会费的国家正给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超出了积累的债务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因为本组织受到妨碍而无法充分完成其任务。这种情况正危险地使现在展开的改革行动复杂化。任何罚款或制裁都无法纠正给国际合作与社会进步造成的伤害。

第四,本组织的全面改革还需要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必须根据其利弊而判断这一微妙的问题。需要避免毫无效益的对抗以及这一根本的改革方面的无限期拖延。

第五,促进非洲的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是该报告一个重要主题。很多发言者在一般性辩论中恳求本组织对经过如此痛苦磨练和考验的非洲大陆采取更积极和慷慨的政策。我国完全支持这一恳求,并将在集体努力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秘书长的报告涉及一大批我尚未展开谈及的其他问题。我谨想强调那些似乎是关键的问题。这绝未削弱该报告其他方面的重要性。该报告本身提供了一个

参考依据,对联合国的行动及大会本届会议的工作极有益处。

我要感谢秘书长并表示希望他明年将遵循同样的程序而提出报告。

达尔格伦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秘书长,对有关本组织工作的报告的介绍,谈到人道主义的挑战。他在一般性辩论开始时的讲话,集中谈到下一世纪人的安全和干预问题的远景。

首先,我要代表瑞典政府感谢秘书长安南谈及这些重要问题的方式。因为这些问题对我们大会中的各位以及对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和整个本组织是重要的,对我们所代表的各国政府也是重要的。它们毕竟对全世界的所有个人也是重要的,他们的安全甚至生存受到人道主义灾难的威胁。

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看到很多这种灾难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东帝汶的暴力,这种暴力以武力的形式拒绝接受民主规则,导致这一应被允许走上和平独立道路的领土上的广泛破坏。另一个例子则是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它迫使近一百万人离开家园、村庄、以及常常是他们自己的家庭成员。还有一个可怕的例子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塞拉利昂数以千计的儿童被叛军从其父母手中劫持走,四肢被他们伤残,被迫使用毒品,被当作儿童兵,经历了最残酷的虐待。

联合国的创立是为了拯救后代人免于战祸。所以,每个会员国的安全都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宪章》确立了一种集体安全的制度。据说,一个国家永远不会再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袭击而得到不到世界其他国家前来营救。

然而安全并非仅是国家的问题。安全还是个人的需要。世界上很多人受到迫害和压迫,生活在威胁其生命的环境之中。我们作为人类同胞,不能对此忽视,哪怕它发生在边界另一侧的另一个国家。国家主权的重要原则不能当作一个帷幕,在后面不受惩罚地进行粗暴侵犯人权的行。

我国政府认为,个人的安全必须看作与国家的安全同样重要。这两个目标是相互联接在一起的。一个国家的长期安全取决于其居民的安全和福祉。过去,一个国家的安全常常被当作破坏其人民安全的行动的借口或托词。

秘书长于9月20日在这个大会堂内雄辩地谈到人类的集体良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一良知憎恨残

酷、谴责非正义并寻求所有人的和平。对我们来说,这一良知还意味着国际社会有义务在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联合国显然是处理这种情况的论坛。因此,必需进行大量的工作来使联合国能够首先在预防冲突的领域中应付这一挑战。我国外长在一般性辩论中宣布:我国政府已采取了一项行动方案,我们希望它能够帮助把注意力从危机管理而改变为早期预防行动。我们不能忘记,联合国掌握着几项预防性外交的手段,应当更经常地加以利用。

首先,必须处理冲突的根源。这包括在全世界铲除贫穷,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人权与廉政。还必须加强给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灾受害者提供救济的能力,并更加努力地防止发生紧急情况。

就这一点达成一致也许并不难。但更困难的问题是,如果暴力争端完全发生在一国境内,国际社会应如何处置。我们如何处理要尊重各国主权但又要在各地改善人类安全的难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人道主义灾难发生在一国国境内这个事实是否自动阻碍联合国采取行动?我认为情况不应如此。

正如新加坡常驻代表星期三在本次辩论中所表明的那样,主权实际上从来不是绝对的。首先,内部争端很可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曾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在今年春季决定制止米洛舍维奇总统在科索沃的行动,我们对未能这样做感到遗憾。

也许还存在着联合国需要为制止人道主义灾难采取行动,其中包括强制性措施的其他范例。这总是需要作出逐案判断,但人们应该在我们大家商定的框架内作出决定。我们面前的挑战是确定共同立场,找出使我们能够在人类安全受到威胁时根据《宪章》的原则与宗旨采取行动的基础。全球治理委员会几年前曾就在出现侵犯人民安全的严重极端情况,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回应时,怎样才能批准干预行动提出一项有趣的建议。

无论我们在这个进程中取得什么成果,都必须铭记这样一个关键事实——即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例子表明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是如何使安理会瘫痪,然后绕过它取而代之采取行动的。因此,我要最后对目前旨在恢复安全理事会权威和加强其合法性的各项努力表示支持。我国政府认为,一个扩大的安全理事会更能反映当今世

界的现实,而且也将更好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安全服务。现在应当把这个广泛抱有的信念化为具体行动。

卡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提交其高质量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该报告即简明扼要又十分全面。秘书长再次一如既往地向我们概述了世界形势的真实情况,当今世界谋求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但日趋为各种冲突滋生的新威胁所折磨。秘书长在这份报告中非常及时地提出了联合国的前景、回顾了在一个全球化主宰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挑战和危急情况。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千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为迎接和平与稳定时代的来临指导我们各项努力,并共同采取行动,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气氛。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向千年大会提交一份载有一整套实际建议的特别报告,使联合国得以在今后的岁月中履行其人类团结使命的建议。

谈到人类团结,秘书长特别关注人道主义挑战,目的是以一种高度相关的方式强调必须落实各项预防战略,以便使我们能够在出现紧急状况之前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我们必须加强磨练我们的能力,以便防止危机和悲剧,并扬弃我们先等待、然后再对悲惨局势、即实际上的灾难局势作出回应的倾向。

面对特定人道主义紧急局势和自然灾害,我们大家都必须通过勤奋、有效和不加歧视地采取行动,顾及这些战争和灾难受害者的需要。在这方面,当务之急是系统的信誉和国际社会的团结。

我要在这里吁请我们大家对这场有关干涉权的困难和敏感辩论持超脱态度,这场辩论在大会内部造成了分裂,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在出现冲突或大规模侵犯人权情况时紧迫地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回应,又要维护各国的另一项权利,即保护国家主权的权利。

我们理解并有能力通过在我们中间建立真正的沟通文化,从这场辩论中获益,这种文化必须以在真正信任气氛下交换意见为基础。最后,我们必须共同思考,我们必须共同行动,制定适当的标准,使我们明天能够对人道主义紧急局势作出集体和有效的回应。

我们还必须共同努力,通过使安理会的运作更加可靠,更具有代表性和更加民主,加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的确,只有联合国才能制定和提出一项具

有普遍性的议程,使人们有可能克服目前的问题和分歧。

就维持和平而言,我国塞内加尔要再次重申,塞内加尔相信联合国可在这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重申其坚定的承诺,即为在全世界适当进行维持和平行动尽量提供支持。

我们同意秘书长表达的意见,即应该重视和优先使用一切政治和外交手段,以及国际社会拥有的各种和平手段,从事预防性外交活动。

我们谨在此回顾非洲国家一再重申的愿望,即增加对非洲统一组织的援助,以加强非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非洲大陆因为冲突局势而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也要在此感谢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使非洲国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干预,展开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紧急援助行动。

最后,我们认为,加强联合国同区域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非洲,能有助于减少冲突爆发的危险。我国代表团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支持秘书长有关需要加强冲突后缔造和平设想的建议,以确保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和国家的恢复。在有关缔造和平的章节内,我国代表团也要强调需要把和平文化的概念纳入冲突后国家重建的一切方针。

秘书长在报告中用相当篇幅谈到消除贫困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成为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一个优先目标。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努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加倍努力,特别是为了刺激投资和增长,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它们在一个被全球化现象推动的经济中被边缘化的问题。全球化尽管有其潜在的机会,但是迄今为止,向我们展示的主要是落空的承诺和第三世界国家不太可信的增长和发展前景。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应付的大胆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世界新秩序,促进消除世界各地冲突与不稳定的根源。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联合国在我们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希望有关秘书长报告的审议能使我们接受所有各方的经验教训,帮助我们阐明下一世纪在维持和平、经济和社会进步和促进人权方面的利害关系和重点。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和赞扬秘书长提出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全面报告。我们也要赞扬他提出一个重要、热门而又敏感的问题供我们审

议——即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会员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的中心主题——面对人道主义挑战——在我们时代有特别意义,这一时代的特点是世界许多地区发生了许多自然和人为造成的灾难与悲剧。在这些危机后,人们强烈认为,联合国需要集中精力作好应急准备,建设能力和缩小紧急援助和早期恢复之间的差距。显然,建立一个预防性文化比仅仅在灾难发生后应急,要更加有利、持久和节约。

为了应付这些危机局势,各种联合国和特别机构之间需要增加有效的合作与协调,我们应继续有力的支持它们各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在应付这些人道主义挑战时,必须提供平等和无选择性的待遇。受影响地区,不论是在非洲或其他地方,都应及时不偏不倚地得到人道主义援助。

在本组织对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战争极其可怕后果毫无行动和在科索沃被迫干预之后,秘书长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的重要问题。对科索沃的干预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扭转了那里种族清洗的可恶政策,但这一干预是在安全理事会之外进行的。秘书长提出这一问题是正确的,因为国际社会显然不能注视这种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悲剧。我们天生的道德感在科技时代的工具——如已经使世界名副其实变成一个全球村的电子媒介——的帮助下,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事实上,这一问题同我们界定或者重新界定联合国在新世纪和新千年中的作用的努力,特别有关。

秘书长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是本组织应付危机局势的效力,包括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各种严重的人道主义悲剧;或者是否应该应付。但是,正如他自己已经指出,有许多可能同武力干预同样有效,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应付办法。武力干预,如果考虑,也必须是最后手段。秘书长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对《宪章》作了创造性的解释,《宪章》是一份活的文件,它的崇高原则现在和以前一样有效。他当然是对的。但同样正确的是问题的根源大多在于同一《宪章》中,即联合国的决策进程,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决策进程。安理会必须找到办法避开经常造成僵局,阻碍协商一致的否决权的作用,后者显然是本组织在卢旺达、科索沃和其他许多局势方面瘫痪的症节所在。

秘书长就人道主义干预问题所提出的难题,应当促使我们就安全理事会改革尽早达成共识,安理会改革进程已浪费了6年。除非进行改革,否则联合国将摇晃不

稳地走入新世纪——距离现在还有83天,带着还没有丢掉的上一世纪的包袱。

秘书长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与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讨论有密切关系的相关问题,但是,他显然把这些问题留给会员国进一步讨论和审议。这是必要的,会员国应该这样做。它们必须对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个人主权的敏感问题这样一个极端复杂的课题达成共识。国家主权被长期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主权现在越来越时髦,但是,它也构成《联合国宪章》一个重要,或许是暗示的组成部分。然而,不论支持人道主义干预的论点有何道理,我们都不能忘记,对任何国家使用武力都必须获得安全理事会授权。同时,干预的原则一旦被批准,就应该普遍使用,即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使用,因为原则上,对雌鹅有益的东西对雄鹅也应该有益。

虽然双方都作出迅速和强有力的反应,但是,没有容易的答案。用来支持各种总观点的有利论断似乎都有理,有说服力,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显然,这不是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就能解决的问题——或许经过今后几届大会都不能解决,而需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认真、深入的审议,就象埃及代表提议的那样。这样的彻底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该问题从根本上影响本组织所有成员。会员国已了解那些已谈到这一问题的国家的初步反应。我们相信,其他许多国家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论坛上,就此问题阐述它们的立场。

副主席布瓦松先生(摩纳哥)主持会议。

维持和平继续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有两个重大的特派团于最近结束任务,但又设立了两个新的特派团。不久可能还会开展更多的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开展了密切合作与协作,但这些区域努力不应取代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作用,也不应解除联合国,具体来讲是不应解除安全理事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维持和平再也不能被视为一种特有和孤立的行动。它应被视为对当代从预防性外交到冲突后缔造和平的日益复杂冲突所作持续不断反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维持和平的范围日益变成多学科性质。我们认为,一种多学科办法不仅将会消除冲突的症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消除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些根源常常是社会、经济性质的。

全面制裁仍然是对一些国家进行胁迫的一个有力工具。不幸的是,它们常常对平民百姓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在针对一国人民实施最严厉制裁长达七年之后,伊

拉克境内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状况。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负有减轻伊拉克人民痛苦的沉重责任,即便是在处理该区域重要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和海湾战争的其他重大但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实施制裁应该极其谨慎,而且只能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在《宪章》所规定的所有其他和平措施都已用尽之后才能实施。制裁应该有具体的目的、明确的目标以及具体的时间范围,而且一旦制裁不再必要,则应完全和正式予以取消。在利比亚一案中就应该如此。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秘书长的意见,即在过去一年里,联合国的裁军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确,新的千年在裁军方面的前景并不乐观。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留给我们后代的未来将存在着人类所制造的最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最近的一些事件也许清楚地预示着核军备竞赛的重新出现。

在国际法院提出关于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历史性咨询意见三年之后,在真诚开展并结束最终导致核裁军的谈判方面尚无任何进展。除中国之外,核武器国家继续阻挠就导致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的核裁军进行认真谈判。在核军备的致命竞赛中,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参赛者,给区域和全球安全带来了种种影响。

裁军谈判会议继续由于其成员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而陷入瘫痪境地。它避而不设立一个核裁军工作组。达成共识的希望似乎与当初一样渺茫。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样,曾要求自动延续该会议的工作方案,而不必每年制订新的任务。如果不改变这种工作方法,该会议的许多工作将会停滞不前。

裁军领域另一个令人遗憾的发展是未能举行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第四届裁军特别联大)。该会议本可以产生新的动力,并确定今后在裁军领域、尤其是在核裁军方面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方面的合作与协作日益加强。在非洲尤其如此。这是一个令人欢迎的发展。然而,尽管区域组织应该而且也的确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但这不能免除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心和主要作用。在与区域组织分担维持和平方面任务时,安理会不能将《宪章》中为其规定的责任分包或转交出去。

也许没有任何冲突工具会象小型武器那样普遍,那样容易得到,那样难以限制。秘书长指出,小型武器容易获得。这在许多情况中加剧了许多国家的暴力和政治动

荡。他说,此类武器在世界各地的扩散破坏了发展前景,从各个方面危害到了人的安全。安全理事会理事会认识到了这一点,它最近讨论了小型武器问题,导致发表了一项重要而全面的主席声明。举行关于非法武器买卖问题的国际会议将大大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鉴于非法武器买卖问题主要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希望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主持这一会议。

我国代表团极其强烈地谴责越来越多的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显然,各国在通过本国司法制度起诉肇事者,或者在任何适当时候和地方通过有关国际刑事法庭起诉肇事者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在设立全球执行机制以审理这些罪行之前,也许需要在必要的时候设立特设法庭。现存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我们强烈谴责在实地发生的针对联合国人员的攻击事件。联合国有义务确保这些人员能够安全地执行其任务,应付武装冲突中平民的需要。这些平民应能不受阻碍地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象嘉奖身穿制服的维持和平人员一样,嘉奖这些人道主义救济人员的勇气和所作的牺牲。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秘书长对全球化问题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我们赞成他所表示的关切,他说:

“...两年来,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动荡使全球经济增长大为减缓。”(A/54/1,第221段)

的确,一些经济体不仅经济增长减缓,而且可悲的是,其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出现逆转,社会进步受挫。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

“世界将来仍然可能发生类似的动荡,因此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此一可能情况发生。”(同上)

这正是我国总理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这两年里一再重申的看法。

我国代表团对大会继续参与处理全球化问题感到鼓舞。今年9月份以全球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为主题举行的为期两天的高级别对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部的辩论及其去年和今年早些时候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一起举行的两个与全球化有关的对话也令人鼓舞。然而,在这些对话的后续行动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在联合国这一独特的政府间组织中提出的关切事项受到布雷顿森林机构的适当关注。

我国代表团还高兴地注意到,今年我们审查全球化的工作有了新方面,即全球化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观点,虽然全球市场力量可以带来财富和繁荣,但在发展不平衡的地方,结果可能是加剧政治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的风险。在目前的情况下,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在意识到全球化带来大量机会的同时对这一方面保持警惕。

还有一些仍有待于人们充分认识的全球化新方面。这些新方面只能由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在多边一级予以处理。有待执行的任务不是使全球化逆转,而是更好地理解它,以使我们能够更富有效率和实效地作出反应。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敏锐地关注着全球化各方面的情况。我们期待着与他、秘书处和其他会员国合作,以确保本组织在这一进程中能够发挥积极、建设性和重要的作用。

希奈先生(阿曼)(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就载于文件 A/54/1 中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向科菲·安南先生表示感谢。它的确是一份应引起大会注意的重要文件。今年的报告之所以值得进行特别审议,是因为提出这一报告时本组织和整个世界正在准备进入新的千年。该报告使会员国对过去作出评价,并调整自己以适应未来。

阿曼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报告的第 36 段中表示的看法:“对联合国来说,没有高于预防战争的目标,没有深于预防战争的承诺,也没有大于预防战争的雄心”。联合国正是为这一目的而建立,它应该致力于使后代免遭战争祸害的目标。这正是联合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预防性外交是一种宝贵的工具,如果利用得当,它可以拯救生命和节省费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静悄悄的外交消弥了紧张局势并预防了战争。现在制裁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干预的手段,但当这些集体措施不能对准焦点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时,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本组织重新考虑其运作方式的时候了。

正如秘书长正确指出的那样,强制性措施不能被定为长期战略。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建议:必须改善安全理事会所授权的制裁的设计和实施工作,以恢复该国际制度的信誉。

冲突不会自发和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产生。相反,它们是各方多年来的紧张局势、不信任和磨擦达到顶点的结果。在这一方面,预防性外交无论是以调停、调解还是谈判的形式出现,对解决冲突的根源来说都是很必要的。长期的预防应该包括广泛的预警系统,

它可以通过与区域组织建立起更广泛的合作关系来建立。

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发展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可以通过充分规划协调和适当提供资助的国际行动来应付这一挑战。通过联合国和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努力,国际社会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这一挑战。根据我们对这种相互依存会带来利益的信念,我国期待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希望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这一组织,并通过坚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的相互合作来有效地发挥作用。

本组织的财政危机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挑战之一。阿曼保持向联合国迅速缴纳应付款项的清白记录。但我们不得不呼吁其他会员国全额和不带任何条件地迅速缴纳应付的款项,以便使本组织能够努力实施其方案和执行预期的任务。我们还呼吁秘书长继续推进对各联合国机构进行结构调整的进程。我们希望这种结构调整将以一种将促进安全理事会作用并反映当代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多样性以及巩固已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重要作用的新兴力量的作用的方式延伸到安全理事会。

一致决定与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一起举行千禧年首脑会议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次真正的机会,它可以发表一项可作为行动计划的宣言,为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一项更为完善的办法。我们认为,规划好这一历史性活动必须有时间和作出努力,我们重申支持秘书长提出旨在改善本组织及其作用的提案和想法。我们还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成为这种办法的基础,从而成为新的千年开始时的新开端的标志,以便实现本组织期望并主张在今后几年里实现的目标。

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首先对联合国秘书长始终如一地出色指导本组织的工作向他表示他受之无愧的敬意,并感谢他关于本组织工作的言简意赅的报告。由于它是千禧年大会前的最后一届大会,它值得我们给予特殊的关注,并需要我们进行审慎和持续的研究。

由于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在我们在这里和各主要委员会研究各议程各项目时阐明其立场和关切事项,所以我将仅就秘书长阐述的一小部分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首先,秘书长的看法是明确和坦率的:在第 7 段中,他提醒我们“在暴力冲突方面,1998 年内最令人担忧的

事态发展是战争的数目显著增加”。他还指出,和平在许多地区仍然是不稳定的,同时,在经济领域,贫困继续加剧。这些明确的看法为我们各国所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然而,联合国通过维和行动、斡旋和调停行动以及发展方案,全面有时是成功地介入了许多局势。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东帝汶组织有关自决的全民公决,尽管在这次协商后出现了不幸的事件。遗憾的是,在其他一些时候,由于缺乏政治意愿,或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或联合国完全无力把握局势,存在着明显的失败。有时,联合国倾向于就一系列局势使用一个单一的解决办法,虽然事情很明显,每一种局势都是独特的,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在这一点上,作为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基本责任的机构,安全理事会——其改革与扩大仍然是必须的——必须发挥其作用,就摆在它面前的所有局势显示同样的决心和坚定;但与此同时,大会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并作为各国显示主权意志的讲坛,必须充分发挥《宪章》赋予它的作用。例如,它可以通过在冲突后时代缔造和平领域采取行动来做到这一点。必须坚决和毫不含糊地声明,在所有情况下,不论其涉及预防性外交、维和、还是涉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会员国的赞同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当时的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纲领”(A/47/277)中就此所讲的。

这里,请允许我指出,今天秘书长提交大会的报告第66段承认

“在没有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将危及《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根本核心。在使用武力方面,唯有《宪章》提供了普遍接受的法律依据”。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透彻和极为确切的看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用以指导我们行动和国际社会的行动,以防止对国际法的任何偏离,而遵循国际法本来是会员国,全体会员国的义务。

促进国际法是每个人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参与编纂国际法。实际上,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制订国际准则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一方面,虽然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我们欢呼它的建立——必须发挥威慑和预防作用,但我们提醒不可过于宽松地解释《法院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不应取代国家法院,后者仍然是唯一有资格审判罪犯和暴君的机构;该法院也不应成为大国对抗的工具。国际刑事法院的可信赖性乃

致它的成功要求它充分尊重会员国的主权和国家法律,尊重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国际法决不能成为政治或政治计谋的牺牲品,或只为大国服务,符合其利益时就诉诸国际法,否则就将其置之脑后。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主权国家采取单方强制性措施也是不可容忍的。

同样,我们也极为关注安全理事会制裁这一敏感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仍然未能对制裁制度作出客观评价,迄今尚未决定在有关国家履行其义务后永久取消此类制裁。在任何情况下,安理会都应尽可能缩小或消除制裁对人民的影响,虽然秘书长在其报告第124段中已建议:“‘高明的制裁’...是在安全理事会决议中直接规定经过深思熟虑的适当的人道主义例外情况”。本着这一精神,我国呼吁取消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不公正制裁,这两个国家已经与本组织进行了充分合作。

如果今天有一个事关联合国使命核心的共同考虑,这个考虑就是我们如何在世界各地并在各种情况下推动保护和促进尊重人的尊严这一庄严事业:归根结底,人应当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受益者。实际上,由于前殖民地国家迅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由于全球化现象——全球化消除了区别、差异和国界——本质上仍是一种发展中文化的人权文化现在已将其影响扩展到世界最边缘的角落。

但仍有十数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十数亿人不懂得阅读或写字,没有可能享有基本的保健服务,而南半球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一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他们身心两方面的悲惨处境似乎并没有令我们的世界文明感到耻辱。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唯一正确的方针应全面、综合和具体地包容了人权:全部人权,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基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需求,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

今天,我们听到有人要求将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或义务,确立为国际法准则。这一建议不论出于何种良好意图,都会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和必然有可能导致滥用,引起许多问题和忧虑。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总统以其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的身份在1999年9月20日向大会的致辞中强调了这些问题。

首先,如何看待所谓国际社会之本的国家主权?如何看待《宪章》所载尊重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如何看待作为国际关系基石之一的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由谁来决定迫切需要对某一国家进行干预,按照什

么标准,在什么框架下,在什么条件的基础上?是否所有国家都有权进行干预,或只有其中最强大的国家才有此权利?小国是否也有权利或可能干预较大国家的事务?

我们如何区分人道主义干预和出于政治或战略原因的干预,什么时候政治考虑会超过人道主义考虑?

最后,对于主要遭受不公平经济制度打击的几十个南方国家里处于文盲、贫穷、疾病和不发达状况的几亿人的巨大痛苦,国际社会的立场如何?这些人也受干预权利的支配,还是这种做法只应局限于侵犯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行为?

这些问题又使我们回到需要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国际法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以不带任何政治和宣传考虑和不争辩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全面和冷静的审查的必要性上。

不结盟国家以及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外长已经作了回答。在大会工作以外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拒绝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因为无论在《联合国宪章》中还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中,人道主义干预都没有法律基础。

秘书长的报告专用了几段谈论非洲,说明了联合国对我们大陆的重视。正如安全理事会 9 月 29 和 30 日辩论突出表明的,非洲大陆面临许多复杂的挑战。

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布特弗利卡总统有机会在大会重申非洲奋起自救和在民族之林中发挥自己作用和占有自己位置的决心。因此,我仅再次表示,非洲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够指望国际社会的支持,充分受益于这种支持。非洲期望国际社会坚决支持非洲复苏的努力。

联合国和大会在这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作为非统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我于 10 月 4 日曾致函大会主席,请他建立大会 1998 年 12 月 7 日第 53/92 号决议决定建立的工作组。我们确信,工作组对于执行秘书长关于非洲和促进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建议将是极其有用的。

最后,我要就一个已经很时髦的议题——全球化问题——作几点简短评论。

全球化被作为具有各种好处的普遍繁荣的旗手提了出来。全球化是一种无法逆转和无法抵制的现象。今天,由于全球化具有阻碍正常运作的方面,并有可能使最贫穷者和最脆弱者边缘化,它提出了许多问题。事实上,正如亚洲危机及其影响充分表明的,如果我们不谨慎,

全球化就可能成为已有许多国家处于文明和进步边缘的世界上的排斥因素,而不是融合因素。

面对这种局势,我们必须通过商定的调节、协调和控制的办法恢复全球化的最初目的。

以上就是我向大会通报的我对全球化现象和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们赞扬秘书长提出以上问题,使我们能够进行令人感兴趣和——我希望——有成果的辩论。

博特纳鲁先生(摩尔多瓦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和先前的发言者一道感谢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分析性报告。该报告强调对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及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局势采取全面的做法。我确信,秘书长的报告和秘书处编制的其他报告对本届会议各代表团的工作将大有裨益。

正如报告指出和我们越来越明确看到的,除其他外,人道主义挑战是今年困扰国际社会的内部和国家间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后果。

我国代表团赞同秘书长对今天内部冲突主要根源的看法。我们认为,他在第 17 和 18 段中讲的话尤其应该加以强调。的确,受战争困扰的国家出现经济滑坡。与此同时,是内部和社会集团之间当前的不平等而不是贫穷造成社会紧张和冲突。在某些情况下,在没有采取辅助性社会政策情况下推行激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方案,可能破坏政治稳定,导致冲突局势。正因为如此,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援助对于转型经济非常重要。否则,改革的巨大代价可能破坏大多数新近独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我们认为,联合国还应该特别关注并更积极参与解决由受到外来支持的富有侵略性的分离主义运动造成的所谓冻结了的冲突。不幸的是,这一问题在报告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

秘书长报告强调,维持和平行动依然是预防性外交各种手段用尽后解决冲突和冲突局势的重要工具。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指出,过去一年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确实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联合国面临着在科索沃以及现在在东帝汶建立大规模和多方面的史无前例的行動的新挑战。我们欢迎秘书长更有效地努力协调这些和其他维持和平活动。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摩尔多瓦共和国确信,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战略是解决冲突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欢迎

秘书长努力特别强调预防外交,尤其是通过进一步改进联合国的预警系统。秘书长提倡的必须从“反应文化”过渡到“预防文化”值得我们的充分承认和全面支持。

在科索沃和卢旺达发生的冲突已为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主权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概念与必须遵守人权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安全理事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已妨碍它履行在这一领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这一事实已公正地受到许多国际行动者的批评。同时,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评价,即

“在没有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将危及《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根本核心。”(A/54/1,第66段)

因此,我国代表团象其他代表团一样,鼓励和支持进一步讨论如何使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必要性符合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目标。在进入下一千年之际,这一问题似乎是对联合国的主要挑战之一。

在最近结束的一般性辩论中,全球化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我们赞赏秘书长努力使联合国适应这一全球化的社会。秘书长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在出现一个全球性民间社会的同时,“非民间”因素的跨国化,并指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采取一致行动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注意报告记载了联合国在处理全球化提出的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最初的积极成果。

在这方面,我想强调,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各国也应同发展中国家一起受益于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债务减免,这一点极为重要。人们认为,使经济处于转型期的新独立国家能够有效地融入全球化世界经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对加强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视。报告强调了三个主要方面:人权制度、特设国际法庭的活动和最近建立的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在这方面,我想通知大会,摩尔多瓦共和国打算在明年上半年批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从而推动这一文件早日生效。

最后,我想指出,摩尔多瓦共和国坚决支持联合国的现代化进程。我国政府高度赞赏联合国去年所做的重要工作。

我们希望明年的千年大会将提供一个机会,能够查明国际社会即将遇到的挑战,并加强联合国在下个世纪

的全球领导地位。一个经过改革并得以加强的联合国在履行未来的任务方面无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坎朱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秘书长在其对大会的讲话中以及他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坚决主张建立一种全球性预防冲突文化,并呼吁制订战略,以避免或应付自然灾害及紧急情况。这是一个最值得赞美的目标。他提议为应付这两个挑战在联合国授权下采取国际预防性行动。

对战争和冲突进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冲突情况下令人遗憾地出现大规模和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在确保使目标人民屈服的残忍战斗中,把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作为战争武器。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索沃、卢旺达、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其他地区的冲突中就是如此。

秘书长主张在所有因战争和冲突引起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采取国际预防行动,不因地理、政治或其他因素而加以区别。已提出的主要主张是,

“不应允许出现大规模和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不论在何处发生。”(A/54/PV.4)

巴基斯坦认为,鉴于对所有会员国的巨大影响,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需要得到认真审查和分析。我们对这种行动的目的、规模和合法性必须明确和没有疑问。我们认为,需要对秘书长的建议给予认真的思考,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包含许多内在的矛盾。直到在国家一级以及国际一级对秘书长提出的各种假设进行充分的讨论,否则就不能对执行这些建议的利弊作出决定。巴基斯坦将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些建议——它们理应得到这些研究——并以适当方式就其提出详尽观点。然而,必须在某些根本参数的范围内看待这些建议。

第一,必须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然而,这一原则不能扩展到以下情况,即在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外国控制下的人民正在为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而斗争。

第二,必须维护而且事实上必须加强大会作为联合国中唯一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机构的中心作用。安全理事会不应侵犯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作用。安全理事会讨论和平与安全问题时必须严格在其授权内运作。

第三,必须明确区分因战争、冲突或争端而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其他人权问题,前者本身的性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后者明显属于联合国人权系统的职权范围,不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

第四,人道主义干预要得到普遍接受,就必须按照国际法具有合法性。它们必须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并在发生明显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或对其构成威胁的事件后,在安全理事会的明确授权下进行。

第五,只有在国际人道主义干预适用于所有局势时,它们作为预防性措施才有信誉。不应有选择性,也不应由媒体推动。人道主义干预应基于人人获得平等公正的原则。否则,这种干预将削弱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第六,应处理冲突和争端的基本起因,而非仅仅现象,以寻找冲突持久解决办法。其范围可包括从自由行使各国人民自决权利到消除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

第七,按照秘书长自己的推理,他应根据《宪章》赋予的责任在大规模侵犯殖民统治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人权情况发生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我们完全同意并支持秘书长的要求,建立有效的预防灾害预警系统,以及适当的国际紧急情况回应能力。虽然这种措施力图处理自然灾害近期后果,但必须发展旨在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以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各种目标。

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的。在全球化进程背景下尤其如此。全球化作为复杂和多方面现象,正在改变国际关系,尤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国际关系。发达国家一直赞扬全球化的益处和好处。发展中国家除苦难的全球化外,并未看到其它东西。东亚各国来之不易的增长和繁荣受到全球化力量损害时,这种情况显而易见。因此,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伤害,使它们受少数富人、庞大公司和非民主金融机构的支配。

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发达国家无法摆脱减轻这一进程给发展中国家人民造成痛苦的责任。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抑制全球化正在释放的力量,这些力量已经严重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秘书长已承认,处理全球化消极影响的责任主要在于世界最发达经济国家。我们同意他的看法,并要求这些国家在这方面采取紧急行动。

虽然秘书长的报告还提及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但该报告未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毫无疑问,环境问题要求全球性行动。我们认为,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所有国家应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应有作用。联合国可发挥中心作用,保证全球化进程基于平等、公正和包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

自1997年起,秘书长对与联合国发展业务活动相关的基金和方案进行了重大改革。不幸的是,这些改革尚未导致传统捐助国在通过这些改革时承诺的增加供资。事实上,这些基金可动用的资源不断减少。

为了补偿用光的资源,秘书长正在探讨私人部门伙伴关系。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这种资源只能补充捐助国提供的资源,不能成为替代物,这种资源不得以任何方式歪曲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优先事项。

秘书长已通报大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国际金融机构和专门机构在把人权准则纳入发展进程方面增强了合作。这种纳入是各国政府的特权,应通过政府间进程进行。有人多次努力使人权成为交叉事项,尤其在发展领域。相反,我们认为发展应成为国际社会的交叉事项。我们认为,促进遵守公认人权准则的最佳方式是落实发展权利并消除贫穷。

虽然联合国正在发起主动行动,以实现2015年前将赤贫减少一半的目标,但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增加了在贫困线下生活的人数。我们必须处理贫穷根源并采取长期战略,其方式是创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以谋求消除贫穷的目标。

最后,我谨感谢秘书长提出全面、发人深醒和挑战性报告,这在今后几个月中必然导致严肃的讨论和辩论。

科尔比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赞扬秘书长向大会提出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出色和发人深醒的报告。

该报告在其许多重要信息中,强调联合国及其机构各种活动之间更密切的相互关系。不能从脱离解决冲突和维持和平努力的角度看待人道主义行动。经济发展包括减免债务、外部援助、善政和人权等问题。这种相互依存对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都是挑战。我们必须保证不同机构的活动协调一致,实现我们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秘书长特别提请注意近年来自然灾害令人不安地增加。必须从人道主义和环境两方面更多地了解自然灾害的起因和后果。在联合国内,有许多处理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环境、环境变化和人为灾害的机构。使这些机构的努力更加协调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和解决办法。

关于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秘书长指出国际社会倾向于忽视一些持久冲突,不充分注重预防行动和预警。

我认为对这是根本性问题有广泛协商一致意见。显然在财政和人力两方面预防费用远远低于修复费用,最昂贵的是两者都不做。秘书长所述被人们忘记的冲突不应继续被忘记。

我想回顾预防性行动信托基金的设立,几个国家的政府,包括我国政府为这个基金提供自愿捐款。我的理解是,在一些预防性外交努力中,这个基金对秘书长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机制。我们将继续支持该基金,并敦促尽可能多的政府也这样做。同时,我想重申我们支持秘书长几天前向第五委员会提出的请求。现在应该作出一切必要努力为联合国的冲突预防努力提供充分的经常预算资金。

科索沃、东帝汶和塞拉利昂的冲突给数以十万计的人带来难以估量的痛苦,并给联合国的反应系统造成新的负担。我高兴地看到,联合国正在与区域组织密切合作下积极参与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作出的努力。

联合国在东帝汶冲突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和建立和平活动,仅仅是国际社会为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通过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的有效参与采取集体行动的重要性的最新例子。

在一个挪威特别关心的问题上,我想与秘书长一道对排雷、协助地雷受害者和实施《渥太华公约》表示乐观。这方面的挑战是巨大的,然而,国际社会已经取得进展。更多的国家批准该《公约》将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我国政府欢迎以下事实: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广泛涉及了非洲的局势。尽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很多迹象,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半数以上人口仍然生活在绝对贫困中。普遍流行病艾滋病造成的代价惨重。虽然在很多非洲国家中有令人产生希望的解决冲突努力和民主化进程,我们尚未取得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成功。

象秘书长所概要介绍的那样,联合国正在非洲参与大量的发展方案、人道主义努力和解决冲突活动。然而,要取得进展需要有资源,而资源在太多的情况下是缺乏的。我们同意秘书长的以下看法:非洲的问题必须继续是本组织的最优先事项。该大陆的许多冲突旷日持久,因此容易被遗忘。它们可能没有得到国际新闻媒介的注意,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努力不应以此为指导。

本组织的重要改革已经实施。我们高度赞赏秘书长致力于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在这些努力中,他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完全支持。值得赞扬的是,创纪录数目

的会员国已经支付了它们1998年和历年的预算分摊会费。但仍有重大的欠款尚未全额支付。有决心的改革进程应该与履行财政义务并行。秘书长预期,本组织对会员国的欠款都无法在1999年支付,至少不能全额支付。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情况,它降低了本组织的灵活性。不允许这样一种局面继续存在符合每一个会员国的利益。

比加索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秘鲁代表团感谢秘书长提出我们面前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它反映了本组织在不同领域中的现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秘书长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和即将在新的千年中处理的人道主义任务的复杂性,以及联合国会员国多么有必要为集体安全和国际制度的稳定和可预见性作出贡献,以便确保我们各国社会的发展。

了解自然灾害的基本原因意味着具体地说明臭氧层正在经历的变化、温室效应气体排出、饮用水的生产、森林减少的后果、新作物的使用以及城市地区的高人口水平的可持续性。由于各国政府和非政府实体的赞助和它们对专业性区域论坛的贡献,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全球不同地区的很多国家发出了警告。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现在迫切需要重新计算它们对预防大西洋飓风今后可能造成的破坏的预测。同样,南美洲西岸国家必须重新分配其资源以面对今后数年的气候变化及其后果:农作物和海洋食品出口的损失、以及对现有公共基础结构的破坏。所有这些所要求的不是在灾难或灾害发生的立即反应,而是长期估计。

对秘鲁政府来说,自然灾害问题是一个最优先的问题。我国在整个历史上受到洪水、干旱和地震的严重影响。

可以回顾,1982-1983年的南部振动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影响了秘鲁,造成将近10亿美元的损失,使国内生产总值降低大约11%。1998年的厄尔尼诺在秘鲁的影响虽然也是强烈的,但由于秘鲁政府所促进的民防系统对预防的强调而不象以往那样严重。它处理暴雨和干旱的战略包括三个阶段:预防、在现象发生时紧急救助、以及修复所造成的破坏。预防包括采取措施保护处于最容易发生灾害地区的人口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生产以及社会和经济基础结构、避免基本公共服务的瘫痪和中断、以及保证下水道的畅通和公共秩序。

由于这些措施,生命和物质的损失降低了。尽管如此,生产仍然大幅度降低。由于渔业部门所遭受的无法控制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勉强增长了0.3%。

用采取这些预防性措施的资金基本上是本国的,但也有部分资金来自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很重要,秘书长强调了需要提供国际援助以便为自然灾害作准备,并强调了交流经验的益处。秘鲁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它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

我国代表团在今年7月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期间表示,承认需要对人道主义危机采取全球性处理方式是极其重要的。这意味着明确的优先次序,特别是在实地工作的机构的规划与有效和高效率行动方面。

我们承认,尽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反应仍然是不充分的。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仍然有令人不安的部门和地理不平衡。必须克服这种不平衡,以便扭转目前的趋势。这种趋势危及人道主义行动的有效性的长期前景。

迫切需要各国表现出促进有需求的人口获得援助并促进各方面合作的政治意愿。在强调这种需要的同时,对我们来说似乎同样有价值的是,秘书长作为他的年度报告的第一点提到发展一种处理自然灾害的预防文化的重要性。

在传统上,我们的区域认为必须避免冲突,而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则必须寻求和平解决办法。为此目的应该尽一切可能进行对话和谈判。象《联合国宪章》中所表明的,只有在第五十一条的范围内才能使用武力,因为使用武力即便是属于最崇高的动机,也会导致暴力的增加,而且武力不大可能成为实现对任何问题的持久解决的办法。

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是可以授权使用武力的唯一机构,它是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机制,旨在保护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一个具体的集团的利益。因此,无视安理会的权限单方面使用武力就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破坏了现代世界中各国文明和平共处的基础。

对秘鲁来说,完全遵守管理国际制度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行为上来说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对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尊重继续是《宪章》的根本原则。国际社会所努力建立的这个司法性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战争并为和平与全人类的福利联合努力。这个组织必须得到维

护,因为削弱国际法在各国关系中的作用的后果将极其严重的。

我们同意秘书长对预防国际冲突的措施所给予的优先地位。我们还同意他关于和平协定需要有必要的经济支持的看法。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该报告中具体提到的秘鲁与厄瓜多尔之间的和平协定。根据这些全面协定,经济一体化和联合项目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构成一种现代的解决问题方案,它不限于解决过去留下来的问题,而是包括以下方面的全新内容:环境保护、河流的自由航行、减少关税和贸易自由化、建立信任措施和广泛的边界一体化协定。这方面的项目跨越10年时间,总费用30亿美元。

秘鲁——厄瓜多尔边界地区的非常贫穷的人口对“和平红利”寄予希望,并期待着国际社会在将于11月29日和30日在巴黎举行的加强和平协商小组会议上为两国之间的边界地区发展计划提供资金。

我国希望强调在安全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以促进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以下情况感到遗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主要机构的基本资金继续出现负增进,这将大大影响最贫穷国家,而这些国家经常出现安全问题基本上是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必需品。

秘鲁完全同意以下看法:消除贫困应视为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其任务包括和平、安全、发展和人权的唯一国际组织,联合国具有在全球争取实现这个目标的非凡资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扬行政协调委员会起草克服贫困行动计划,并于1998年10月将其发送联合国的所有驻地协调员和国别工作队。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将促进实现在2015年之前将绝对贫困减少50%的目标。秘鲁制订了一项减少贫困战略,使我们能够限制、稳定和减少贫困;在1990和1997年之间,秘鲁的极端贫困从27%减少到14%。

最后,秘鲁感到满意的是,在消灭贫困方面,联合国所有机构之间正在进行更多和更有效的协调,正对在联合国召开的社会发展会议上达成的各项协议采取充分的后续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报告中提出的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专题之间的联系。

波尔斯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要表明,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关于本组织今年工作的全面和周密的报告(A/54/1)。

此刻时间已晚,我谨就两个方面简要的谈一下看法。正如主席在上星期六总结一般性辩论时表示的那

样,报告中涉及到的人道主义干预的议题已引起大量的讨论,秘书长把该议题作为他在一般性辩论开始的讲话的主题。

包括我国外长唐·麦金农阁下在内的很多参加一般性辩论者,就秘书长有关在捍卫人权方面需要把普遍合法性和实效融合在一起的论点提出了看法。我国外长明确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在遇到包括种族灭绝和最严重的对人类犯罪在内的人道主义灾难时采取适当行动,这种行动永远不应受制于否决。

无论是1994年在卢旺达,还是今年初在科索沃,或者是在东帝汶人民8月底于联合国的投票中行使自己自由选择后经历的对他们展开的恐怖行为等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都具有威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的潜力,恰巧属于安理会应处理的事务。

尽管如此,在过去两星期中大量谈到了国家主权与人道主义干涉权利之争。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种无结果的辩论,不幸承担起南北对峙的很大一部分包袱,这使我们在这里的大部分工作纠缠不清。很可能没有任何有益的结论。

对抗很难照亮面前的道路,极为抽象的概念之间的争论尤其不能如此。我们宁愿相信最终负责把我们送到这里的人民——我们各自的公众——的常识和激情。在这种日益迅速相互关联的时代,人们对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具有更广泛的意识。公众要求他们的政府需要制止无论可能在哪里发生的万恶和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时,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而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采取行动,它确实会有在我们各国的公众眼里失去其存在意义的危险。它变得无关紧要,这是一种政治现实。

我们在联合国这里所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宪章》以满足“我人民”的实际——我强调是实际——的期望的方式加以执行,《宪章》是为他们而写的。

最后,对于秘书长报告中的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我要赞扬他提到本组织在过去一年对变化的管理。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的努力,这种努力已在联合国的总体管理方面取得实际改进,我们期望继续发展以成果为基础的预算作法,包括很快提交的样本预算。

埃尔瓦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今天讨论本届会议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它涉及各种人道主义挑战,我们要感谢秘书长对这一议题的兴趣。我们认为回顾过去一年的事

件及本组织的各项活动,会给各会员国之间更严肃的辩论提供充足的材料。

我们不时面对的给人造成悲剧和痛苦的人道主义局势,超出了—个国家的边界,是由几种因素造成的。它们有时产生于自然灾害,另一些时候则产生于人为的灾难。

后者被称作冲突或争端,可以分类如下:一,由另一个国家在某一国家内造成的冲突;二,叛乱集团在各国内造成的冲突;三,涉及某区域几个国家并由外部分子所煽动的复杂的冲突;以及最后在没有任何政府或中央权力机构的国家内出现的冲突。

这些冲突及其之间的差别,使我们需要找到不同的方法加以对待,并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全面的办法来处理所有根源,尤其是社会和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应集中精力于把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我们在由叛乱集团即非法团体在一个有政府和中央权力机构的国家造成的冲突中使用武力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样就会在那些在法律或逻辑方面不相等的情况中也使用同样的措施。

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应集中力量支持和促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区域努力。我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具有政治意愿,那么就会导致冲突的解决并使我们能够避免人间悲剧。它还会使我们摆脱武力干预的灾祸和威胁,很多国家鉴于这种干预违反了五十年来制约国际关系的两个重要的国际法原则而对此表示保留,这些原则即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及不干涉其内政。

当我们仍从三种不同的观点来辩论该问题时,怎能说明绝对的人道主义干预的理由?在人道主义局势中的一种干预,基于某些强大国家的主观考虑,另一种则基于视一种重要的局势是否影响国家利益而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作法;而在第三种情况中,则只是在需要处理人道主义灾难时使用武力。

在所有三种情况中,都存在着政治决定可能受媒体对—人道主义危机的报导的影响的危险。或许索马里的危机就是对这种危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饥饿儿童的画面曾促使乔治·布什总统的政府派美国部队赴摩加迪沙帮助分发粮食。但是,当美国公民看到一个死亡的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在摩加迪沙街头被拖曳的景象时,克林顿总统的政府不得不在几个月后撤回这些部队。这种干预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更多的骚乱、暴力和国家解体。

这些强国的一些官员曾公然说,在信息和技术时代,我们可以把电视——特别是有限新闻网——视为安全理事会的第16位成员。这些官员显然忘记了有限新闻网也在导弹攻击我国希法制药厂时马上对这种侵略进行了报道,而安理会却甚至还没有开始对这场侵略的后果——特别是对这种不正当的单方面行动的人道主义后果——进行讨论,这种行动超出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各项国际法及人道主义法原则。有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有高尚的道德。

鉴于我所说过的话,秘书长对人道主义安全概念的评论仍需得到更多的辩论、讨论和研究。我们完全相信,大会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主论坛,是达成协商一致前承担这项任务的终端机构。没有大会,我们就不能看到任何实施这项概念的办法。

在这方面,我要提及我国对外关系部长上个星期对大会所说的话:

“我们也抱有秘书长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我们重申必须在冲突爆发前,为消除冲突根源最大限度地加强集体努力,并利用一切拥有的手段制止冲突。”

“但我们认为,采取任何行动或使用任何手段都必须征得有关国家的认可和同意,而且还必须在国际法和国际标准框架内,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框架内进行。”(A/54/PV.19)

在这些框架外并在没有公正、民主和透明国际制度情况下绝对要求干涉国家内部事务,意味着进入一个动乱和强国称霸弱国的时代。

我还要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总统已概述了脆弱小国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担心,他说,这些国家对任何涉及其主权的事情都特别敏感,这不仅是因为主权代表着它们抵御不公正世界规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也是因为它们没有有效参与通过安全理事会决议或监测其执行情况。

我们还要对秘书长报告的其他方面发表评论。这些方面包括因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而出现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及难民问题和全球化及其后果。

关于人道主义问题,我们赞赏该报告涉及对各机构类似呼吁所作的回应。但是,令人感到关切的是,对这些呼吁作出的回应仅占1999年需求融资的大约31.6%,而且随后又被拒绝。虽然我们理解困难局势使得人们势

必满足东南欧的人道主义需要,但这并没有证明应减少对其他出现紧急人道主义局势的区域、特别是非洲区域的援助。我们也同秘书长一样对为非洲危机作出的回应不断减少感到痛苦和悲伤。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捐助界所做的回应以平等和公平为基础,在各区域之间没有任何歧视,因为人道主义状况代表着所有区域的共同因素。

在回应世界上一个或另一个区域的人道主义局势一级采取持续有选择的和优惠的办法,只会使人道主义安全和有力干预的概念受到各种人道主义理由的影响,并使人们对其真正动机和目标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因此,我们有些人担心实施这一概念只是为了某些国家取得国家或战略利益。

我们要谈的有关秘书长报告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向难民提供援助。人们高兴地注意到,同前几年比,1998和1999年初没有出现多次难民潮或人员流离失所情况。报告第215段提及,在苏丹的大多数埃塞俄比亚难民已能够在1998年自愿返回其家园。

第214段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武装冲突在非洲之角造成了新的大规模难民流离失所。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及,非统组织去年12月在喀土穆主动召开了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以讨论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非统组织所有成员国、联合国和各志愿组织和机构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以便处理其根源并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提供适当条件。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和多项建议,希望国际社会为执行这些建议和最终解决该问题协助提供必要支持。

最后,我们要对秘书长就全球化提出的各种挑战所表达的意见表示支持。各个国家不能单独面对这些挑战。这种局面要求进行多边合作。我们完全相信,联合国作为一个最具有代表性和最民主的国际组织,仍是最有资格处理全球化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种种影响和男女平等与公正问题的国际论坛。

阿里亚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秘书长在其发言中打开了一个充满重大问题的潘多拉盒子,这是一个大胆和及时的姿态。它公开提出了已经显而易见的主权原则和人道主义干预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令人不安但不可避免的难题。

的确,尊重主权是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大家都同意。同样,我们在道义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有责任对大规模野蛮侵犯人权行径作出回

应。我们许多人也同意这一点。因此,似乎很显然,当这两项原则发生冲突时——例如当在一国境内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时——人道主义干预应该被置于法律保护伞之下——即不应在国际合法性边缘进行干预。

换言之,所谓的干涉权应该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授权或支持;我们许多国家能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也是秘书长发言中提出的棘手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因这种或那种原因瘫痪时怎么办?难道在 21 世纪国际社会应听天由命,面对一种滔天暴行,因为一个成员使用了否决权而袖手旁观?难道人类的集体义愤应被严格遵守主权原则或者被某一个国家的阻挠意愿而扼杀;在世界社会倾向于采取行动时,一方面绝对无二地尊重主权,另一方面或者有时某一大国的自私意愿,就能压制国际社会的大声抗议吗?

这些问题对国际安全,对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当然对联合国的未来,极为重要。大会应能找出解决办法。

下午 6 时 05 分散会